

中央苏区研究系列
曾志刚 张玉龙 主编

市场·革命·战争

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

游海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苏区研究系列
曾志刚 张玉龙 主编

市场·革命·战争

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

游海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革命·战争：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 / 游海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中央苏区研究系列/曾志刚，张玉龙主编)
ISBN 978-7-5161-7150-9

I. ①市… II. ①游… III. ①闽粤赣革命根据地—研究
IV. ①K269.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336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328 千字
定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因其在中共党史、革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重要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有关苏区这段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大陆学界乐道的话题。学术机构和研究部门的成立、林林总总资料的整理出版、不少有影响的论著与论文的问世以及系列纪念性、学术性会议的举办，凸显出这一领域持续备受关注的的基本态势与研究的一般进展。

从学术史角度梳理，苏区史研究一度是台湾地区和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前，台湾地区和西方学界一直围绕着“国民党为何丢失大陆政权”或“谁丢了大陆政权”而责问不已，苏区时期国共两党的成败之鉴自然而然成为学者们探究的旨趣所在。不同的是，台湾学界一直沉湎于强调中共革命的“阴谋论”和回避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而西方学界在经历近三十年的高层路线研究之后，开始从社会经济史的路径去追寻中共革命何以能够成功。到80年代后期，当西方与台湾苏区史研究兴盛之风逐渐消退之时，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是持续升温。不过，从所使用的话语系统、研究路径与研究视角视之，大陆苏区史研究大致历经了由传统革命史范式向社会史与“新革命史”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前，与西方学界早期的苏区史研究主要围绕“中共革命何以成功”问题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一，大陆的苏区史研究则主要围绕“政策一效应”的模式展开，属于传统的革命史书写范式^①，其结果往往致使“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与当时的历史文献十分接

^① 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部分敏锐的学者着手寻求中共党史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张静如先生率先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1991）。何友良先生所撰《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堪称这方面的开篇之作（1996）。

2 市场·革命·战争: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

近”，进而“大大遮蔽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曲折、艰难和痛苦”^①，而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于传统分析模式引发弊端的反思，导致寻求研究思维转换和方法的创新逐渐成为学界的追求，并因此而产生了诸多有价值且令人瞩目的学术性成果。

作为中央苏区史研究与红色文化传承的平台，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适逢其会“预流”入中共党史研究由传统革命史范式向社会史与“新革命史”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从中获得不少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上的经验和启迪，出了较好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即将推出的《中央苏区研究系列》，既是中心与国内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协同创新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同仁运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结晶。

游海华博士的著作《市场·革命·战争：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以来历经市场、革命、战争诸变量多重冲击和洗刷下的赣闽粤边区社会经济的变动和转型基本过程与阶段性特征，以及这一变动与转型在中共革命、民族抗战与社会整合中的作用。

钟日兴博士的著作《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考察了中央苏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社会革命动员机制以及这一机制的运行在乡村民众的革命化、乡村社会资源整合、苏区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宏卿博士的著作《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原中央苏区的土改为中心的考察》，以江西的土地改革为考察核心，试图从以乡土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挖掘革命与后革命年代的亲和力和路径依赖及其与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之关联与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江西曾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又是土地改革的新区，对其土地改革运动的研究极具典型性。

在学术环境日益优越与宽松的当下，运用新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对苏区史的若干问题、史事进行深入探究和客观评价是学界义不容辞的

^①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我们相信，上述著作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相关的观点与见解自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且也是推进苏区史研究发展的台阶之一。

是为序。

编 者

2015年10月3日于中央苏区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问题与思考	(1)
第二节 研究地域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3)
第三节 学术回顾和研究思路	(6)
第二章 市场变迁与地域社会经济发展	(14)
第一节 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	(14)
一 传统商道的延伸	(15)
二 公路交通网的崛起	(19)
三 邮电通信网的兴起	(22)
四 信息传递的变迁	(25)
五 结论	(32)
第二节 农业的演进与转型	(37)
一 传统农业的兴衰嬗变	(38)
二 农业新因素的诞生与成长	(49)
三 结论	(56)
第三节 寻乌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	(58)
一 就业观念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59)
二 生产经营观念和市场风险意识日趋成熟	(64)
三 消费观念的商品化和“西化”趋势	(70)
四 结论	(73)

第三章 生态环境变化与中央苏区革命	(77)
第一节 社会生态环境变迁与中央苏区革命的缘起	(77)
一 市场变迁与社会经济剧变	(78)
二 市场变迁与地方社会转型失控	(83)
三 结论	(87)
第二节 吉泰盆地的生态环境与东固革命的兴起	(88)
一 暴动前吉泰盆地的生态环境	(89)
二 地方中共知识分子与东固革命	(97)
第三节 “九打吉安”中的农民动员	(105)
一 党和红军的组织动员	(105)
二 农民动员机制和策略	(108)
三 结论	(114)
第四章 战争与地域社会经济变动	(116)
第一节 国共争战对赣闽边区社会经济的影响	(116)
一 战争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流动,人口性别 比例严重失衡	(117)
二 持久的战乱几乎耗尽了边区社会所积累的财富	(118)
三 战争打断了边区固有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122)
第二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赣闽粤边区的人口运动	(127)
一 中央苏区劳力的从军参战运动	(127)
二 苏区革命时期赣闽边区的迁逃难民	(134)
三 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中的三边地区 非正常死亡人口	(137)
四 抗战时期涌入三边地区的难民	(139)
五 40年代后半期外迁的三边人口	(141)
六 结论	(143)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赣闽边区难民的救济	(144)
一 赣闽边区战争难民概况与难民救济的缘起	(144)
二 赣闽边区战争难民救济概貌	(147)
三 免政:特殊的战争难民救济	(151)

四 结论	(155)
第四节 债权变革与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秩序	(157)
一 中央苏区革命前后的债权变革	(157)
二 债权变革对当地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	(162)
三 结论和讨论	(169)
第五节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173)
一 现代交通通信网络的初步形成	(173)
二 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产业潮	(178)
三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	(186)
四 民众国家政治与民族意识的强化	(190)
第五章 后中央苏区时代赣闽边区恢复与转型	(195)
第一节 市场与商业的复苏	(195)
一 市场与商业的恢复性成长	(195)
二 市场与商业复苏的原因	(202)
第二节 农村经济的恢复	(207)
一 农村经济复兴方案及其筹办	(208)
二 赣闽边区农村金融网络的构建	(214)
三 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	(223)
四 结论	(228)
第三节 地方公产的处置	(233)
一 问题的缘起和相关学术回顾	(233)
二 社会重构与祠堂寺庙公产处置规则的初步确定	(238)
三 乡村义务教育的创办与地方公产处置规则的变更	(242)
四 祠堂寺庙会社等公产的实际处置	(246)
五 结论	(254)
第四节 民众的政治生存状态	(257)
一 三年游击战争初期赣闽边区的民众生存状态	(257)
二 从战后处置看赣闽边区的民众生存状态	(263)
三 停止对抗的原苏区军民的实际生存状态	(269)
四 结论	(273)

4 市场·革命·战争: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

第五节 地方政府的现代化转型	(274)
一 以精简机构、节省经费来衡量裁局改科 是否合适	(275)
二 裁局改科是否提高了县政府的行政效率	(279)
三 以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来评价县府的裁局 改科是否恰当	(286)
四 结论	(289)
第六章 结语	(292)
第一节 市场之变迁与激励	(292)
第二节 革命之兴起与动员	(295)
第三节 战争之机遇与破坏	(297)
第四节 战后之回归与延续	(300)
主要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16)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问题与思考

但凡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都免不了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是越来越集中，还是越来越分散？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进而可能追问：什么比例的地租率才是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即农民家庭经营的生产效率高，还是规模经营的大农场效率高？民间借贷是好还是坏，为什么盛行？什么是高利贷，什么比例的借贷利率才是合理的？中国农民是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近代中国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抑或是停滞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是内因占主导，还是外因起决定性作用？……

跨入 20 世纪以后，以上问题引起了中国社会精英的关注和思考，并引发了他们挽救农村、复兴农村的实际行动。例如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国民党主持的农村改进（二五减租、农村合作、扶持自耕农尝试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①，等等。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革命史观叙事，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标准答案。这些标准答案是革命的思想基础和革命合法性的依据。毋庸置疑，革命发动者当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救国救民于倒悬。依照标准答案，当然的逻辑推论无疑是：革命成功之后，大多数问题将

^① 参见游海华《近百年中国农村建设考察》，《福建论坛》2009 年第 1 期。

2 市场·革命·战争: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

迎刃而解，乃至不复存在。

事实证明，革命功成乃至历经长期的建设之后，原来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未得到消解，有的问题（如民间借贷、贫富分化、城乡和地区差别等）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间还冒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城市病、生态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显然，革命史观叙事的标准答案，似有简单化之嫌，不是一个学术思考的结果。

当然，即使从学术的角度，要解答上述问题也属不易。

首先，要从总体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自然环境、人口、交通、农业、工业、金融、财政、贸易、消费等经济领域内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还要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战争）、外交、思想、文化、社会心态等诸因素做深入的研究。很明显，这不是单个学者所能完成的事业，而要依靠学术团队的协同攻关；这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而要依靠长期细致的科学研究。

其次，中国国土辽阔，地形地貌多样，气象水文不同，不同区域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迥异，所谓“东南西北中、各个不相同”。我们年复一年见诸的事实是，北方闹旱防旱，同时空的南方却苦雨防涝；东南沿海台风肆虐、雨水绵绵，西北内陆却艳阳高照、天高云淡。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他说：“以中国之大，除非划定区域，进行这种整体研究是非常困难的。”^①因此，要对这样一个复杂、多样情形国家的近代经济状况作全面的、整体的描述，其困难程度不亚于攀登学术的珠穆朗玛峰。

正因为如此，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看法，从问题提出以来就各说各理，纷争不已，贯穿了整个20世纪，延续到了21世纪仍然少有共识和定论。^②除其他原因以外，其主要根源之一，就在于论争者将区域典型性的观点当作中国普遍化的结论，即论争者将某时某地的研究结论，

^①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② 李金铮所撰写的《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就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纷争一个方面的反映。参见李金铮《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当作中国整体的解释。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比较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即“只有首先对各个局部进行深入研究并总结出各个局部的具体特征之后，才能从中归纳得出整体的特征”。^①除此之外，区域研究方法还能较好地兼顾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内在关联，避免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或渲染某一方面的作用，有利于从总体上提升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这样可以接近“总体史”的目标。^②

基于此，对于“单干”的经济史研究者来说，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相对为优，也更为可靠。本书即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考察的区域则是近代的赣闽粤边区，讨论的主题是：在市场、革命、战争等因素作用下，近代赣闽粤边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动与转型？这些变动与转型给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第二节 研究地域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赣闽粤边区是指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毗邻的广大区域，包括江西省的赣东南、福建省的闽西、广东省的粤东北地区。其中，赣东南主要指广昌、石城、宁都、瑞金、会昌、寻乌、于都、兴国、赣县、赣州、安远、信丰、定南等十余县市；闽西主要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龙岩、连城、宁化等数县市；粤东北则主要包括平远、蕉岭、梅县、兴宁、大埔、丰顺等数县市。这是从行政区划来定位的。

从地理区位看，赣闽粤边区的中心地带是南北斜贯的武夷山脉南端余脉和东西横亘的九连山脉的相交处，其所属的上述众多县市行政中心散落于山脉的河谷地带或盆地中央。正是由于这一山地环境（崇山峻岭、

^①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② 参见李金铮《区域路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论》，《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

沟壑纵横、山体宽厚等),决定了边区地处三省边陲,交通不便,不仅远离三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南昌、福州、广州),而且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传统统治者的眼中,这是一个贼渊盗藪、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边区诸多县份的初始冠名,如安远、宁都、长宁(寻乌县原名)、定南、镇平(蕉岭县原名)、平远、武平、永定、宁化等,无不折射着传统统治者的忧思,及其所寄予的长治久安、永享太平的愿望。

然而,从市场的角度看,赣闽粤边区绝不是孤岛,隔绝于国内外经济文化圈之外。首先,尽管关山阻隔、交通不便,然而边区自有顺山势而成的贡江、汀江—韩江、梅江—东江等天然河流,这些河流及其支流将三边地区紧紧相连,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边区与外界沟通的主要进出口通道。这一水运网络和边区纵横交错的古道网络,不仅通达赣州、南昌、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三省区域中心,而且连通武汉、上海、天津、香港和日本、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清末民国时期,邮电、铁路、公路等交通通信系统的构建,以及电报、电话、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通信和运输方式的兴起,进一步完善了边区的进出口网络。

其次,尽管明中期以前,三边地区还是一个人口甚稀的边蛮之地,但是此后该地区山长谷荒的原始景观渐渐得以改观,地方市场星罗棋布,内部互动与交流日趋增多,社会经济呈现一定程度的发展。^① 依赖上述传统的进出口网络(水运网络和古道网络),边区和外界的交流频繁而密切。19世纪中叶以来,凭借东南沿海开放口岸尤其是汕头的地利之便,边区地方市场日趋勃兴,内部各县市的交流与互动更为频繁,其与国内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也更为密切。

当然,选定这样一个区域作为研究区域,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近代赣闽粤边区具有几个鲜明的特色,能够从区域典型性中较好地反映出中国的普遍性。

其一,赣闽粤边区是中国典型的传统农村社会的丘陵山区。粮食作物种植是边区农民谋生的主业,造纸业、榨糖业、刨烟业、织染业等各种传统手工业盛行,以农为主、副业为辅的农民兼业行为普遍,家庭经营是最

^① 参见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1986年第2期。

基本的生产单元；距离省级中心市场较远，地处国内外市场网络的终端，近至民国前期绝大多数县城仍然保持着“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这是“前近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标准化”的所谓“自然经济”状况。这一具有丘陵山区特色的典型传统农村经济，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中辗转前行，展现了其逐步走出传统经济束缚的全部过程，从而为我们观察与研究传统农村经济的变迁和转型进程，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

其二，赣闽粤边区有较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冲击的经历。近代以来，广州、厦门、汕头、福州相继成为中国沿海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作为这些通商口岸的腹地，赣闽粤边区因有与出海口相呼应的便利交通网络，其地方区域市场日益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一部分。西方商品、科技、文化、生产方式等源源不断地输入并潜移默化地影响边区。伴随而来的，是近代“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野蛮掠夺性，以及与中国传统专制体制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这为我们观察“市场经济”影响下的近代中国区域变动与转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窗口。

其三，赣闽粤边区历经革命与战争洪流的洗礼。它不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农民暴动的频发地，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斗争的指挥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京国民政府则对之发动了多次“围剿”，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对当地游击队又展开了多次“清剿”。这里，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抗战的大本营，不仅赣闽粤浙四省党政军机构纷迁至武夷山脉山麓坚持抗战，沿海和东南沦陷区的难民、工厂、学校、银行、医院等也纷迁至以赣闽粤边区为中心的国统区安身立命。革命与战争的洪流，一度涤荡了边区的角角落落。革命与战争，带给了边区怎样的洗礼和影响？边区人民又是怎样顺应并展开创造？

纵观之，早在西汉时期，赣闽粤边区就被纳入中原统治者的视野，有了于都、赣县两个最早的县治。历经朝代更迭，到明末清初，边区最终完成了县治分设的工作，奠定了县治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①从这个意

^① 参见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统治版图基本组成区域之一的赣闽粤边区,是中国的缩影,具有其他区域所共有的一般性暨普遍性。与此同时,赣闽粤边区独特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使得其在中国众多的区域中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从而增强了研究该地区所具有的典型性。发掘其普遍性,可以总结出近代中国区域变迁与转型中的“同”;研究其典型性,可以归纳出近代中国区域变迁与转型中的“异”。条缕史实,求同析异,知古鉴今,展望未来,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基本任务,也是笔者的兴趣所在。

第三节 学术回顾和研究思路

或许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远离省级政治经济中心,明清以来,赣闽粤边区似乎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盲点”。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动农民暴动,掀起苏区革命,创建革命政权,边区一度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它自然成为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关于该地区的研究,形成了三支各有研究旨趣和学术传统的研究队伍。

一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队伍。进入 21 世纪以前,这支队伍主要以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发生发展史、革命斗争史、土地革命史、革命人物等为主要研究内容^①;跨入新世纪前后,前述内容在继续为部分学

^① 代表作有:吉水革命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吉水革命斗争史》,1959年印;中共于都县委革命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于都人民革命斗争史》(三修稿),1960年印;龙岩地区党史研究分会等:《闽西革命史论文资料》,1981年编印;马齐彬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夏道汉、陈立明:《江西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温锐:《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闽西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编撰了以县市为单位的人民革命史,如《长汀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赣南在稍后也开始了这一工作,如《宁都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等。

者拓展的同时，中央苏区的经济史、社会史、新闻史、妇女史、思想文化史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①，凸显了学者们研究视野越来越宽广的特点。总体说来，研究者的主要问题意识是：“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发生？”“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成功？”换言之，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梳理清楚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探求和说明革命的合法性，研究重心自然落在党的发展史、斗争史、建设史和贡献史等上面。

在一段时间内，赣闽边区的国共斗争史或中共发展史，也曾是台湾地区部分学者的关注热点^②，其问题意识除和大陆相同（“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发生？”）外，更主要的是探讨和说明：“中央苏区的革命何以崩溃或失败？”在基本史实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当然也存在屏蔽或忽视相关史实的情况），由于长期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之党史姓“党”，海峡两岸革命叙事的风格非常突出，研究结论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时代烙印。相对说来，大陆党史学界研究课题陈旧，重复现象普遍；研究视角偏窄，思维相对单一。^③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革命叙事风格和“炒现饭”现象并

① 代表作有：孔永松、邱松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孙家骅、刘云主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2001年印；谢一彪：《中国苏维埃宪政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钟俊昆：《中央苏区文艺研究：以歌谣和戏剧为重点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舒龙、谢一彪：《中央苏区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何朝银：《革命与血缘、地缘：由纠葛到消解——以江西石城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代表作有：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江西时期》，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年出版；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国立”政治大学高级研究生毕业论文；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③ 1999年4月，《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举行座谈会，与会代表认为：“过去的党史研究中，存在着研究领域窄、研究课题陈旧、重复的现象”；1998年6月，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共同召开了“中共党史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座谈会”，盖军、张静如、金春明、杨奎松、郭雄等均表达了类似观点。虽然他们是就整个党史研究现状而言，但具体到中央苏区革命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党史专家发表上述观点一晃又过去